

# 聚焦良政善治 開啓香港政治新局面



閻小駿

已故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一生曾提出西方政治學中許多極為重要的論斷。在1968年出版的《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書中，亨廷頓於開篇即明確提出「國家間最重要的區別是管治的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即是一例。

## 現代政治核心評判標準 應是治理成效

1968年是20世紀具特殊意義的年份。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布拉格之春」；法國發生被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稱為「社會革命」的「五月風暴」；越共領導的民族解放陣線在春季攻勢中一度攻入親美南越政權首都西貢；美國國會廢除了「金本位」儲備制度；日本則慶祝明治維新100周年。這一年，法國試爆了氫彈，成為中蘇美英之外第五個熱核國家；美國的「阿波羅8號」任務首次進入月球軌道並實現繞月10圈；中國內地則成立了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悄然啟動載人航天醫學研究……在人類意識形態鬥爭和政體競爭的高峰時刻，亨廷頓明確提出現代政治的核心評判標準應是治理成效，而非意識形態標籤，這是難能可貴的遠見卓識。

以治理成效而非意識形態標籤作為觀察政治的核心標準，是理之必然。西方政治學各流派雖對國家(有組織的公權力)之產生源頭眾說紛紜，但一個基本共識則是，國家的誕生目的是旨在解決人類公共生活中的秩序缺失問題；有組織的公權力——主權國家——為無序的人類社群生活提供了秩序，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具公共性質的「治理」。

正如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著作《利維坦》所言，主權國家改變了史前時期人與人之間如同「狼和狼之間的關係」，正式宣告「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結束，人類生命不再「孤獨、貧困、污穢、野蠻又短暫」(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而進入有秩序、有道德、穩定的國家政治生活。實現良好的治理，確保人類公共生活在主權管治下的穩定性，確保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是現代社會的普遍共同目標，也是人類之所以得以存續及繁榮的主要原因。

## 香港長期是意識形態鬥爭受害者

追根溯源，儘管具體的政體形式千變萬化，考察一個政治體治理水平的核心標準和尺度，必然也必須是「管治的程度」和治理效果。公共生活的質素、政府治理的成效，歸根結底體現在廣大民眾親身可感知的秩序感、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無論對政府、政黨還是代議士，民眾福祉都是公共治理的出發點，是政治活動的基本依歸，亦是社會發展的中心目標。就世界範圍而言，只要這個出發點和中心目標不受極端化意識形態干擾的國家或地區，治理成效往往處於令人滿意的水平；而在這個出發點和中心目標受極端化意識形態、種族矛盾或分離主義等消極勢力嚴重牽制的地方，治理成效往往不盡如人意，有些地方甚至淪入「失敗國家」的陷阱。此消彼長中呈現出的歷史大趨勢，發人深省。

香港長期以來是國際意識形態鬥爭和「標籤化」政治生態的受害者。本來，政治制度的設置不是做擺設，而是要實實在在管用，要能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兩個維度上給民眾帶來切實保障。

但由於在整個20世紀，香港先是西方殖民主義對亞洲擴張的最前沿，後又成為東西陣營間意識形態冷戰鬥爭的最前線，兩相疊加，造成香港社會一部分人對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及公共事務的看法，往往不是以「治理」成效為標準，而是習慣性地以「意識形態」色彩為標籤。這些以意識形態標籤論人論事的作法，或者以意識形態臆想決定行動方針的短視，最終結成的苦果，則是整體社會出現政治上失序、經濟上困頓、社會面撕裂、文化教育領域極端化的不幸景況，甚至一度走進全面「泛政治化」的泥沼，其中的歷史教訓是深刻的。

## 要回到「管治程度為中心」的政治討論

2019年在內外複雜因素交織影響下，香港發生了較長時間的社會風波。目前，由亂到治、由治而興的歷史轉折已經開始；但療治世道人心、癒合社會撕裂、促進人心回歸，尚待長期的艱苦努力。**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實現最大範圍的政治團結、開闢新政治局面，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社會各界要重新回到以「管治程度」和治理效果為中心的政治討論中，集思廣益，以民為本，深入思考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長期未得到解決的各類民生問題。這亦要求社會各階層、團體、派別乃至國際社會各「持份者」，在確保本港政治社會大局穩定這個關鍵點上找到「最大公約數」，在確立良政善治這一共同目標的基礎上畫出「最大同心圓」。**

確立良政善治共同目標，有利特區經完善後的政治制度在實踐中穩健運行，有利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效開展工作、協調各方、實現治理目標，是香港保持經濟發展、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本前提條件，更是廣大香港居民安居樂業、實現心中理想所必需的環境保障。

確保政治社會大局穩定、確立良政善治共同目標這兩項關鍵議程，理當成為香港處於政治光譜不同位置、具不同政治抱負的各界人士之間達至政治團結的共識基礎。

## 團結「軟抵抗」者 是新的艱巨課題

當前，對本港政治社會大局穩定構成威脅的潛在對抗性元素，居於社會關係網絡的不同節點，需依法加以認真辨識、甄別及應對。但正如王陽明先生在《與楊仕德薛尚謙書》中所寫，「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如何通過有效的溝通工作和有說服力的良政善治成效，來團結在理念、信仰甚至價值觀層面，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及國家治理香港基本方略存在懷疑、牴觸甚至「軟抵抗」情緒的人士，是我們時代對治港者隊伍提出的、一項需用實踐來回答的新的艱巨課題。在維護政治社會大局穩定這個基礎性、全局性問題上，我們務必「常懷遠慮、居安思危，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致廣大而盡精微』」。

香港地處東西之間，華洋雜處，歷史記憶及社會成分極為駁雜，大家觀點各異、理念不一，即使在通常所認為的「建制派」內部，也存在這樣那樣的歷史芥蒂、利益糾葛和政治主張，這不足為奇，也是必須予以尊重的現實情況。但無論身在香港社會哪個位置、處於政治光譜哪個點位，大家所具有的最大共同特徵是都以香港為家，希望香港這個「家」更美好、更安定、更繁榮、更開放。「家和萬事興」，相信只要我們化除畛域、戮力同心，在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一定能開闢新天地，繼續成為中國版圖上別具魅力的偉大國際都市。

作者為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

## Andrzej Walicki——從一個過來人的剖白 再考察極權主義本質



思潮 陳家洛

30多年前，歐洲的共產政權在毫無預告下迅速解體，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是反思這個時代中最大禁忌的時機——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本質和對一切在其治下的人和事的扭曲踐踏。當中，有不止本來是「過來人」的剖白，讓我們難得一窺他們的心路歷程。已故波蘭歷史學家安傑伊·瓦里奇(Andrzej Walicki, 1930-2020)是其中較少被提及的，與主流論述不同，Walicki承認自己年輕時曾願意接受共產政權這個「新現實」，被其進步發展觀這「新信仰」所吸引，而不是因為蘇聯強迫下接受共產政權的，因而有特別的參考價值。

在那個高壓時代，Walicki親眼目睹搜捕(包括反抗共產政權的父親)、公審反革命分子、無處不在的權力鬥爭，以及個人崇拜等種種邪惡之事。不過，因為出身和背景「的原罪」，及對波蘭傳統民族主義有所保留，他情願將波共(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權及其所作所為視作「歷史的必然」，不為任何人的喜好和道德標準所撼動，甚至接受一些「必要之惡」。他以為自己有本事一邊對那些邪惡的事情保持頭腦清醒，一邊則要避免在「新時代」被針對排斥而變得無所作為，甚至強調這個獨特的取態不是機會主義。

## 極權主義的邪惡

作為「再教育」的對象，Walicki只可在大學主修偏門(不受波蘭學生歡迎)的俄羅斯研究。這些掣肘，反而鼓勵了他試圖在研究中引證，即使擁抱官式馬克思意識形態的思想家，也可以包容另類的思潮而產生新知識。不過，在出版了兩篇得意之作後，其「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圖謀」隨即被學生批鬥和同儕排擠，繼而不斷要經歷思想審查及面對來自負責思想教育的黨幹部的威脅。在「斯大林時代」，趨炎附勢之徒向統治集團表忠、表愛、表信任，不怕「跟車太貼」，只怕跟得不够貼。統治集團透過政治、利益、精神面貌的連繫，與他們中間爭權逐利的競爭，而表現出舞爪張牙的戰鬥格，「國師」和「政權代理人」總是大量供應。他們重複波蘭被(共產)時代選中，進入了正確的歷史新階段，撥亂反正，指摘Walicki這種人居然身在福中不知福。結果，這連串外在的環境因素造成的心理壓力愈來愈強大和不可思議，Walicki對自己已被日以繼夜的針對感到愈來愈難熬，因而得了情緒病和肺病，必須入住療養院。

即使在被陷害期間，Walicki仍努力嘗試尋找妥協空間，以換取再被接納的可能。同時，他

波蘭歷史學家Andrzej Walicki總結自己的掙扎，認為最基本也同時最重要的自由，是每個人的內在的、良知的和獨立判斷的自由。 陳家洛



► Andrzej Walicki (網上圖片)

強調所指的向現實低頭，並不包括同意逼害他的人是正確和正義的。換言之，他希望透過這種矛盾的認知方式，為自己找到生存空間和意義。

最終，Walicki算是成功了，但不是因為自己的能力才華，而是斯大林去世之後不足一年，Walicki以「自我解放」來形容跳出這個固有框框，從此他不再接受「新時代」，拒絕「新信仰」，還直截了當將斯大林時代的極權主義和希特勒的納粹政權等同起來，甚至表明共產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親身體驗到斯大林主義最罪大惡極之處，在於它不止強迫我們忍受謊言，更強迫我們同流合污；積極說謊，試圖剝奪最後的個人自由，包括保持緘默的自由。」('Stalinism was for me the worst evil, for it enforced not only the toleration of lies, but also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lying, and attempted to deprive me of "the very last freedom, which is respected by all tyrannies, and the freedom to remain silent."')

這名波蘭歷史學家的經歷發生於上世紀50年代，是其中一個在很早之前已經內化畏懼而表現合作的讀書人，從個人利益角度，理性地祈求可換取一些安樂日子。作為順民，他們對政權的所作所為也許持批判態度，對當權者都不必心悅誠服，不過為確保麻煩不會找上門，他們都很自覺地配合統治集團，有點自作聰明，有時甚至機警得矯枉過正。只是在極權時代，這樣溫柔無力的抵抗都被扣上「個人主義」或任何帽子，他逃不了被批鬥逼害的厄運。

Walicki總結自己的掙扎，認為最基本也同時最重要的自由，是每個人的內在的、良知的和獨立判斷的自由。隨著「後斯大林時代」來臨，集體主義及個人崇拜告一段落，他終於又重回「個人主義」的思想起點。雖然那些曾經參與打壓和排斥他的同僚稱讚其「從來未受斯大林主義欺騙」，他反指自己受逼害同時也是自作自受，絕對不曾是一個頭腦清醒而義無反顧的「反斯大林主義者」。他明確指出，自己的故事絕對不是什麼邪不勝正的宣言，他承認自己的而且確曾渴望被「新時代」接納而合理化尋求妥協的選擇，所以也不是清白無辜的受害人。

## 機會主義者自欺欺人

在「後斯大林時代」，Walicki埋頭苦幹，建立自己的事業、思想的綠洲，積極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立錐之地，但亦沒有鹵莽行事，跟政權保持距離，這樣的「自由」沒有保障，小小的特權也不算寶貴。正值團結工會運動崛起之際，他在1980年代先後到澳洲和美國的大學任教，繼續專注俄羅斯和波蘭思想史的教研工作，退休後回到波蘭華沙定居，在那時候共產主義已成過去。

我們在今天回顧Walicki的事迹和心路歷程，仍然有一種跨時代的參考價值，讓我們對極權統治的本質有清晰的認識，解釋到為何野心勃勃的統治集團到今天仍要死抱教條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推出層出不窮的「決定論」，為絕對統治的地位製作大大小小的論述口號，劃紅線又定禁區，跟無處不在的敵人進行永遠的鬥爭，是一個無日安寧的世界。

作為極權主義時代的「過來人」，Walicki關注的是被剝奪了個人自由和尊嚴的社會。他判定極權主義社會的目的就是絕對、完全的服從。每個人面對制度對身心的威脅，由內心到言行都在嚴苛的、有組織的、全天候全方位而且是直接的政治及道德壓力中度日。

**極權主義社會通過自我神化，鑽研如何以完美姿態面向世界：個人崇拜、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敵我矛盾統統都可用來灌輸毋庸置疑的必然性，不論是方向和方法上都要層層統一思想言行，這個對思想和價值觀的箝制，統以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的面目示人，就是極權統治的本質。明乎此，機會主義者其實都是自欺欺人，但他們之中又有多少個會如Walicki般承認自己從來都不是清白無辜的？**

參考資料：Andrzej Walicki, 'The Captive Mind' Revisited: Intellectuals and Communist Totalitarianism in Poland'. In Ellen Frankel Paul ed., *Totalitarianism at the Crossroads*,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1990, 51-96.

作者為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比較管治與政策研究中心總監

## 民主運動一夕全輸？ 挫折解放無限可能



鄭立

最近讀了蔡子強先生的訪問，他表示，面對民主派在議會中被消除、多人被捕，以及各種不利民主派的法律制度更改，民主運動30年的成果，「一夕之間輪掉所有」。

## 民主派非種樹人 更像採果人

從九七前去到今天，不論是英屬香港政府，還是今天的特區政府，香港市民有多少的自由、對民主派有多寬容，都只是政府的政策，並不是民主運動的成果。民主派是乘着港督彭定康推廣直選而興起的，因為彭定康而學會和信任選舉，民主派只是這個風潮的受害者；日後特區政府雖然抗拒民主派，但也有很長時間未有特別去肅清他們，所以民主派也是寬容的受害者。

所以，蔡先生說的東西，並不是民主運動的成果，種下果樹的人並不是民主派，民主派的角色，更像是採果。民主派這30年建立的東西，是民主派自己，包括各種傳媒、選舉機器、人員團體、在教育界社福界的脈絡、各種資產等，以及他們龐大的支持者，以及香港人新一代普遍對於民主制度的認知、期許與信仰。

## 民主派受重創 民主認知卻強化

而這要分開兩方面來說。如果單論民主派私有的東西，那的確是受到重創；但是香港人對於民主制度的認知、期許與信仰呢？經歷這幾年，恐怕是強化了不少。在此之前，香港人對於民主的認知是膚淺的，會覺得選舉就是民主，投票選民主派就是支持民主，民主就等於自由法治、普世價值，民主就是繁榮自由，上街遊行就能夠爭取什麼。

而現實環境給了大家當頭棒喝，過去各種粗淺的認知都被淘汰。這幾年，對於民主的體會與對香港的歸屬感，相信有很大增長。過去，整個民主運動的主題和資源，都集中在選舉遊戲之上，今天反而是將一切解放出來。香港的民主運動從只有一種可行性，變成無限個可能性。

況且，蔡先生，就順你的意，政府不打壓民主派，2020年有普選，事情又真的那麼美好嗎？請看看上一次立法會選舉，建制派龐大堅實的票數，你是否有察覺到，就算是普選，會贏的可能都是建制派？民主派可以安樂退休，但之後就會無以為繼，愈選愈少議席，成為普選議會中的少數派，再繼續萎縮下去，民主派也只會多活幾年、慢性滅亡而已。這樣的結局會比較好吗？

作者是專欄作家